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情态录

主编 朱育和 张勇 高敦复
顾问 张绪谭

清华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前言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回顾	(员)
猿爱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愿)
圆爱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员)
猿爱“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和学习	(员)
源爱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	(员)
缘爱 年对胡适的批判	(员)
远爱胡风案	(员)
苑爱关于“综合经济基础论”的讨论	(员)
愿爱从整风到反右派——“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 社会主义革命”	(员)
怨爱红专辩论	(员)
员爱“拔白旗、插红旗”	(员)
员爱交心运动	(员)
员爱对“新人口论”的批判	(员)
员爱“反右倾”斗争	(员)
员爱“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	(员)
员爱群众性学习雷锋活动	(员)
员爱“反修、防修”	(员)
员爱社会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员)
员爱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员)
员爱关于道德问题的争论	(员)
员爱对“写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的批判	(猿)
员爱对“时代精神汇合”论的批判	(猿)

猿援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	(猿猿猿)
猿援“清官”问题讨论	(猿猿源)
猿援关于“让步政策”的讨论	(猿猿缘)
猿援对“合二而一”论的批判	(猿猿源)
猿援批判《海瑞罢官》	(猿猿猿)
猿援大字报	(猿猿园)
猿援破“四旧”、立“四新”	(猿猿愿)
猿援“红宝书”	(猿猿怨)
猿援“斗、批、改”	(猿猿远)
猿援“五·七”道路	(猿猿苑)
猿援样板戏与“三突出”	(猿猿源)
猿援“上、管、改”	(猿猿苑)
猿援“批林批孔”运动	(猿猿怨)
猿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猿猿苑)
猿援评《水浒》运动	(猿猿苑)
猿援批判“唯生产力论”	(猿猿园)
猿援“天安门诗抄”	(猿猿愿)
猿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猿猿愿)
源援“伤痕文学”	(猿猿缘)
源援对《苦恋》的批评	(猿猿远)
源援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	(猿猿缘)
源援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	(猿猿愿)
源援“五讲四美三热爱”	(猿猿怨)
源援反对精神污染	(猿猿苑)
源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	(猿猿苑)
源援“补课说”、“失败论”及其批判	(猿猿园)
源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猿猿愿)
源援愿年代的“文化热”	(猿猿远)
缘援新时期“毛泽东热”	(猿猿园)
缘援《邓小平文选》的出版和学习	(猿猿愿)
后记	(猿猿园)

前言：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回顾

关于意识形态领域历史的研究，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就一般意义而言，作为思想文化的泛称^{〔1〕}，意识形态领域与政治、经济领域同为当代中国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若就其实际的历史地位来说，即就意识形态领域对共和国政治、经济及人们社会生活的实际影响——这种影响在一定时期里左右和决定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走向和面貌——而言，意识形态领域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又具有一种“枢纽”（或类于毛泽东喜用的“纲举目张”的“纲”）的意义。

意识形态领域在当代中国史上的影响之深巨，也影响了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自身历史的研究。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对意识形态领域问题所持有的谨慎小心、敬而远之的态度，正是这一影响的反映。由此，也就造成了最重要的问题其研究恰恰是最为薄弱这样一种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奇特现状。

正是本着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历史研究的目的，我们编纂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情态录》一书。书中对建国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现象，疏理其源流，记述其本末，并按其时序加以编次。力图在现有资料基础上较全面、客观地展现这些事件、现象的真实面貌，并大略勾勒出建国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风云变幻、新陈代谢的历史演进轮廓。

这是一部资料性质的书。书中对事件、现象的记述，都以原始的材料为主，而少有编者的议论、分析。

这本书又不仅仅是原始资料的汇集,在记述每一件事或现象时,我们对原始材料作了初步的删削、排比,注意了对事件、现象的背景、起因、过程中的起伏转换以及对以后的影响的介绍。这样做既是为了区别于一般的专题资料汇编,多少体现一点编者“撰述”的微意^[10],也是为适应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

由于本书以记事为主,且每事单独成篇,这样就使读者不容易看出诸事件之间在横向和纵向上的联系,难以得到关于建国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历史演变的逻辑图示,从而缺乏对意识形态领域历史的全面的、历史的把握。对于此种不足,我们将通过这篇前言,力图有所弥补。

在这篇前言里,我们将对建国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作一宏观的描述,并对影响这一历史演进过程的主要因素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一些特征等作适当的分析和点评。在此之前,为了行文方便,还有必要作以下几点说明:

(一)“意识形态”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初现于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史上,“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含义,也有一变迁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意识形态”是一个批判性(或否定性)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适应一定的经济基础及相应的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其根本的特征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盖现实的联系。简言之,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中同统治权力相联系的一种“虚假意识”,对这种社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11]。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有了新的变化。在列宁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阐述中^[12],“意识形态”是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来使用的。列宁认为,意识形态是反映一定的社会存在、体现某一社会阶级的根本利益的社会意识。在当代社会中,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无产阶

级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中,意识形态的对立与斗争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斯大林对列宁的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强调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必要性^[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来自苏联。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及我国理论界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其基本含义同列宁、斯大林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解释是一致的。既指一般的社会意识系统(如文化、思想),更具体地指某一阶级的思想和观念形态^[2]。辨析“意识形态”概念的演变过程,是为了界定我们使用这一概念的含义。本文中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依照列宁、毛泽东及我国理论界通行的一般解释来使用的,即指的是一定阶级的思想、观念、理论体系。

意识形态又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它是由各种具体的意识形态——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教育、伦理、艺术、宗教、哲学等构成的有机的思想体系。这些具体的意识形态及其载体(包括各种传播形式和各有关机构、组织、部门等)也就构成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领域(亦即思想文化领域)。

(二)意识形态领域历史的研究是以各意识形态及载体的具体运作以及由之构成的总体(总和)实践为对象的。它大致应有两方面的基本内容:意识形态(主要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及其自身的发展变化;意识形态基本原则的社会化(包括其形式、途径、方法及其过程等)。具体就我们这里所涉及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而言,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理论探索、创新和发展(包括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的探索和发展);党和政府在不同时期有关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大规模的群众性马克思主义普及教育运动和经常性的思想

政治工作^[10] ;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如哲学社会科学及各分支学科、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的发展状况等。

显然,在这篇前言的有限的篇幅里,要对上述内容作面面俱到的详尽的分析介绍是不可能的,也是力所难及的。因此,我们除了极概略地介绍建国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各时期的基本情况外,将更多地侧重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历史走向和影响及决定其走向的诸因素的评述。

(三)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是一个整体,意识形态领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在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进行回顾时,似乎没有必要对其发展过程的阶段作不同于当代中国史的新的划分。因此,以下将仍分为四个时期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进行回顾。这四个时期是:国民经济恢复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6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1976—1976年);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时期(1976—1989年)。

—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的七年,是共和国历史上极富生气、变革剧烈的时期。对外,人民政府以近代以来的中国统治当局所不曾有过的独立自主的形象出现于国际政治舞台,并领导中国人民以大无畏的气势抗击骄横不可一世的西方头号强国美国的挑衅,迫使其不得不通过谈判来结束其不光彩的战争,新中国在世界上开始得到各国的敬佩和尊重;对内,人民政府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最新纪录,并在此同时,花大力气对旧的社会制度、行为方式、观念民俗进行了全面的改造,从而为新中国的巩固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规划了前进的方向。

在建国后的头七年里 ,与中国政治、经济的全面刷新相一致 ,中国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空前的变化 ,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这一变化的最根本的和显著的表现 ,一言以蔽之 ,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 ,是一个“除旧布新”的过程。“布新”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普及和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作为指导思想被贯彻的群众性实践 ;“除旧”则是指在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中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以及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的一系列重大举措。“除旧布新”是前七年共和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旋律。

“除旧布新”的基本理论依据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 :“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由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 ,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 ,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即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 ,培养国家建设人才 ,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 ,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并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 ,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

《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有更为详细的阐述 ,其要点为 : (员)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近代以来 ,随着中国新的经济、政治力量的发生发展 ,作为其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为之服务的新文化也产生了。与这种新文化相对立的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 ,即旧文化。新旧文化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不打倒旧文化 ,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圆)“五四”以后 ,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 ,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成为中国文化战线或思

想战线的新的生力军,承担起领导中国新文化运动(文化革命)的重担。“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亦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国民文化的方针和基本性质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同社会主义文化是不尽相同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不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因此,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的共产主义的方法,同作为国民教育的新民主主义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1])

《共同纲领》和《新民主主义论》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规定和阐释,是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针,建国初期意识形态领域“除旧布新”的实践,首先就是在此指导思想和方针的指引下进行的。尽管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认识的变化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除旧布新”也有了一些新的内容(主要是加强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但上述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诠释乃具有其基本指导意义。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概括介绍“除旧布新”的主要内容并对其间的变化予以评述。

(一)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学习

马克思主义,即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方法,应当在新中国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居于领导地位,这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是说得很清楚的。建国初期,为了强调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性质,避免将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与社会性质相联系而可能导致的对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误解,在《共同纲领》中,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领导地位,是以“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

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来表述的^[70]。在提倡和鼓励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针指导下,党和政府的各级理论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充分运用报纸、广播、出版、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各种手段,在宣传、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指导对这些理论、知识的学习方面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加强党员和党的各级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1953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成立马列学院(1953年11月1日,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这是一所为党的高中级干部学习研究马列理论、提高理论水平而设立的专门学校。以后各地都先后设立了马列学院和党校,分别承担组织各地各级党的干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全党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逐步趋于系统化和制度化。1953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决定》指出:“现在国内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较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必须极大地加强起来。”《决定》对党员理论学习的步骤、时间安排、考核方式、理论教员培养等作了较详细的规定;《决定》还特别强调党的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并号召全党一致努力为“逐步铲除党内的理论落后现象和造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高涨而奋斗”。

——加强党的各级宣传机构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工作。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各级党的宣传机构在理论教育方面的工作是:“领导或推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包括爱国主义的宣传),领导或推广对于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在1953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

会议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对党的马列主义宣传工作作了更明确的阐述,指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教育自己和全国的人民,这就是今天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必须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教育人民,而不是用其他任何观点和方法去教育人民”,而要做好这一宣传教育工作,就“要运用好各种宣传工具,如宣传员网、报纸、刊物、出版、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广播、学校等,要把这些宣传工具都搞好、都加强,统统动员起来、运用起来”。为贯彻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配合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宣传出版部门系统地、有计划地编辑出版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尤其是1954年代初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两篇著作的重新发表和《毛泽东选集》(员—猿卷)的编辑出版及为之所作的大量的宣传、解说,对于促进建国初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开展有组织、多形式、群众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学习和普及活动。建国初期,党和政府通过多种形式组织社会各阶层的人民群众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学习运动。仅据郭沫若在1954年12月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中的统计:在建国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参加政治大学、政治训练班学习的人数达1500万,参加工人夜校、工人业余文化学校学习的人数约1500万,参加市民业余补习学校学习的人数为1000万,参加农民冬学学习的为1500万人。另有全国大中学校师生1500多万人参加了政治学习。在这些各种类型的学习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社会发展史,阶级、劳动及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新民主主义理论等都是学习的主要内容。建国初这一全民性的政治学习运动是一次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普及运动,它激发了广大人民政治学习的热情,对于全国人民认同新社会

会、抛弃旧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这种全民动员的政治学习运动的方式,也对以后历次政治学习运动有明显的影响。

除了建国初这种大规模的政治学习运动外,在建国后进行的历次重要政治运动(如土改、抗美援朝、镇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等)中,也都曾有针对性地组织各界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知识。这种结合实际、结合自身的学习,对于人们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方法,确立新的判别是非的价值观,也都是有意义的。

——树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思想文化界的理论指导地位。思想文化界承担着用精神产品教化人民的重要功能,是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渠道。因此,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指导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传播,尤其是对从事思想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和训练,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新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得以确立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党和政府及毛泽东本人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

1959年10月,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

对旧学校旧文化事业的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旧体制旧设施的改革,一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二者中,后者的重要性又远远高于前者。在“改革”、“改造”的过程中,确立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则是贯穿始终的主旨。

国民教育是综合地体现思想文化诸功能的重要部门。对旧教育制度的改革,是建国初党和政府思想文化工作的重点。在对旧

教育制度的改革中,课程改革是首当其冲的重要一环。1952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对此的要求是:“大学中学的课程必须继续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加强革命的政治学习,合理地精简现有课程。”因此,在当时课程改革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课的设置是最突出的标志。1952年12月,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关于整顿高等教育的决定》就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学生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及毛泽东思想……政治课时间占全部授课时间的百分之十至十五。”与之同时,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则规定“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政治经济学”为高校文法两学院的公共必修课。1953年12月教育部发出《关于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对各类高校马列主义理论课的设置做了详细、统一的规定。在此前一月,本着“加强政治领导、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建设,为高等教育建设事业打下坚强的政治基础”的目的,中共中央转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在高等学校试行政治工作制度的报告》。该报告为高校政治工作机构(政治辅导处)规定的任务是:“(1)指导全体教职员工的政治理论学习;(2)协助教务处指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课程的教学;(3)指导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社会活动;(4)掌握教职员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情况,管理教职员和学生的历史、政治材料,主持毕业学生的鉴定,参加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参与教职员的聘任、升迁、奖惩等工作”等。高校马列主义理论课的设置及政治工作制度的实行,从教育内容和教育组织上保证了马列主义在高等教育中的主导地位。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建国初就开始了。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就此说:“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等几门课程。”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各地

都举办了各种训练班 组织教师、社会文化教育工作者、青年学生、失业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学习 ,使他们受到了初步的马列主义教育。1951年秋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全面展开。这是一次全面地对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运动 ,它首先就是由北京大学教师的政治学习运动拉开序幕的。

对旧的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其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确立马列主义在思想文化工作中的理论指导地位。毛泽东对此有着超出同侪的更清醒、敏锐的认识。除了对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提倡和关心(如他对李达的《实践论 解说》、《矛盾论 解说》给予高度评价 ,鼓励李达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通俗宣传方面多做工作 ,精心编辑《毛泽东选集》等)外 ,他更注重的恐怕还是在于要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宣传 ,尤其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宣传 ,他更强调的是 ,一切文化形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为现实的中国革命和建设服务。建国前 ,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曾在这些方面做过许多努力。毛泽东本人在抗战期间所写的一些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中 ,有关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论述 ,有关意识形态的功能的阐释等 ,正是集中反映了人文社会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研究的成果。建国后 ,毛泽东希望看到人文社会科学在这方面的新的进展而不是相反 ,这大概也正是他之所以要一而再地亲自发动和主持思想文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评论 ,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评论 ,对胡适唯心思想的批判等) ,并在批判中多次表现出不可抑制的激愤之情的重要思想动因之一。在毛泽东的思想中 ,实践和运用要更重于理论和书本。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 ,不在于书本上的、教条式的理解 ,而在于对其观点、方法、立场的把握和运用。所以在“两论”中 ,他更看重《实践论》 ;所以在建国初 ,他就说过“中国的

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10]。当然,不仅仅是历史学,别的学科其实也如此。

(二) 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文化意识

正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死敌,它们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服务的。因此,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的影响,既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也是新中国对旧的社会基础进行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除帝国主义文化的影响,在建国初是以认清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正确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清除近代以来在中国各社会阶层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崇洋、惧外的文化心态为主要内容的。出于当时的国际背景及国内斗争的需要,清除帝国主义文化意识影响的工作,又是围绕着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育这一中心具体展开的。

新中国建国前夕,美国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中国共产党人因势利导,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新闻机关、学校以及各界人士中发起了对美国“白皮书”的讨论。通过讨论使广大人民、尤其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受到了有关帝国主义的本质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性的教育,接受了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解释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的初步训练。建国前夕关于“白皮书”的讨论,拉开了新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清除帝国主义文化意识影响的序幕,为新中国诞生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后,首先对外国在华的新闻报刊广播机构进行了管制,随后又逐步停止了同中国无外交关系的外国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在华的活动。对于外国在华举办的文化教育机关和宗教团体,以及接受外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构和救济机构等,人民政府在允许其继续存在的前提下,也陆续采取相应措施将这些

机构或由国家接收或改为中国人民团体自办。人民政府的上述措施 结束了帝国主义自近代以来在中国的文化侵略活动 ,有利于肃清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影响(据当时统计 ,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与宗教团体 ,在中国全部接受外国津贴的同类机关团体中占一半左右)。

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后 ,为配合抗美援朝运动 ,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反美时事宣传。这是建国初期一次最具声势和规模的反帝爱国教育运动。1950年 10月 15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提出 ,这次宣传的基本内容之一 ,就是要使“我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 ,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 ,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15月 15日《人民日报》社论《开展抗美援朝的政治教育》进一步要求“迅速改变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 ,而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以抗美援朝为具体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指出在宣传教育中要“特别着重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思想 ,肃清帝国主义长期在中国人民中所传播的一切有害的影响和半殖民地奴化的买办思想以及国民党反动派思想的残余 ,发扬民族自信心和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传统 ,树立打败帝国主义的信心”。这次反美爱国宣传运动范围广泛 ,形式多样(集会、游行、讲演、墙报、座谈会、控诉会等) ,效果显著。如当时的总结所说“经过这一运动 ,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政治认识普遍提高……百余年来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形成的种种民族自卑心理也为之一扫 ,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大为提高”^[1]。它不仅有力地配合了抗美援朝运动的进行 ,也对在意识形态领域清除帝国主义文化意识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

建国初期在意识形态领域扫除封建主义的影响的工作 ,主要是结合对旧社会基础的改造一起进行的。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其社会基础仍以传统的封